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交流研讨会暨“方志青年大讲堂”第二讲举办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

要论述,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动青年干部将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地方志工作实践,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7月22日,由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志办”)机关党委主办、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承办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交流研讨会暨“方志青年大讲堂”第二讲在国家方志馆成功举办。中志办、国家方志馆、方志出版社全体青年干部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中志办青年干部许明岩、杨洁、刘佳柠作主旨发言,围绕各自岗位实际,分享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体会与思考。

许明岩从深度学习、聚焦主责、青年担当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人事



■讲座现场

中志办/供图

工作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内在契合点,指出人事工作是政策执

行的关键一环,是干部监督的前沿哨所,是政治生态的源头塑造者,要在

加强作风建设、严格选人用人等方面发挥正向引领作用。

杨洁结合秘书处工作实际,从秘书工作与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紧密联系、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具体要求、争做“四有青年”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强调秘书岗位要在办文、办会、办事中严守纪律规矩,切实发挥表率作用。

刘佳柠围绕规范财务管理制度、强化财务人员培训、典型案例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财务工作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具体举措,并建议从加强政策宣传、完善监督机制、提升人员素质等方面,持续推动财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青年代表积极发言,交流学习体会,提出意见建议,增进互学互鉴。大家表示,将以本次“方志青年大讲堂”为起点,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认真做好

本职工作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落实院党组关于青年工作的工作部署结合起来,持续深化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理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在修志问道中锤炼过硬本领,涵养优良作风,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中志办秘书处、人事处、行政处负责同志分别对三位青年干部的报告进行点评,对青年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以及展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中志办青年胸怀“国之大者”,主动担当作为,深钻细研业务,苦练文字功底,积极参与青年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努力成长为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骨干力量,为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中志办/供稿)

民俗学者说民俗

热在“中伏” 静以避暑

◇ 意娜 (民族文学研究所)

2025 年中伏自 7 月 30 日始,至 8 月 8 日止,共 10 天。“中伏”在中国传统历法中属于一种“杂节气”或“时令时段”。它既非二十四节气之一,亦非传统节日,而是结合节气(夏至、立秋)与干支纪日法,对一年中最炎热时段所作的精细划分,是“三伏天”的核心组成部分。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中伏”的说法,足见其炎热程度。“三伏天”的计算体系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其核心为一套基于“庚日”的推算方法。在干支系统中,“庚”属金,而夏季属火,依据“五行相克”中“火克金”之理,古人认为“庚日”是金气被火气所逼而潜藏之日,遂以“伏”名

之,意为“潜伏”“屈服”。此外,“伏”亦有“静以避暑”之意,体现出古人顺应天时、调节作息的智慧。这一经验在现代气象学中亦得以印证:中伏期间正值北半球陆地热量积蓄的峰值,气温高、湿度大,常见“桑拿天”般的闷热天气,即“上蒸下煮”的气候特征。具体而言,“三伏”的划分以夏至为起点,自夏至日起数第三个“庚日”为初伏(10 天),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中伏的长短取决于夏至与立秋之间“庚日”的数量:若有四个庚日,则中伏为 10 天;若有五个,则中伏延长至 20 天,俗称“双中伏”。立秋后的首个庚日则为末伏(10 天),此种以节气为基准、干支为节律的算法,将天文周期与气候变化巧妙融合,反映了中国

古代农耕文明中“因时制宜”的生活理念。面对酷热的“暑邪”,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一整套顺时养生的实践。其中,“冬病夏治”最具代表性。中医认为,中伏时节阳气最盛,适宜通过“三伏贴”等外治法调理体质,有助于缓解冬季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与风湿痹痛。饮食方面,民间讲究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绿豆汤、苦瓜、莲子等成为应季佳品,“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节令食俗亦在调养中体现生活节奏。这些做法虽源于经验,却与现代医学提倡的清淡饮食、补充水分、注意休息以防中暑的原则不谋而合,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高温事件日益频发,“中伏”的炎热也愈



■7月20日,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三义街中医馆,医护人员在准备“三伏贴”。图片来源:东方 IC

加剧烈。作为传统时令,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更关乎当下公共健康的现实关切。将古人的节气

智慧融入现代生活,或许正是我们应对高温挑战、实现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进路

◇ 彭馨蓓 完权 (语言研究所)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1916 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通常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奠基之作。当前语言学界主要的研究取向,比如形式语言学、认知功能语言学、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基本是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框架的延续、发展和迭代更新。这些发轫于西方国家、主要基于印欧语事实的理论目前依然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组成内容。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看,中国语言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还处于筚路蓝缕的阶段。中国语言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领学科建设,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回望“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相向而行

不少西方学者曾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结合起来。跨学科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等都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关注过语言现象,这些理论本质是社会政治学研究,但也不乏对语言的洞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以费尔克劳、范迪克等为代表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对现实话语的研究更为深入,对语言本体研究的启发也更大。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是直接标举马克思主义取向的语言本体研究。

苏联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掀起“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研究热潮,其标志性事件是斯大林 1950 年发表

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受其影响,我国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短暂地开展过“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的论述并形成原著辑录,尝试探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语言观。尽管其理论框架略显粗糙,引用说理的内容多用于阐释说明的部分,但这些研究贵在将语言文字实践工作纳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是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术理化的初步探索。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应赓续前辈学者的研究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科。

学科建设的两大理论立场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根据《王力语言学词典》的定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语言的学说,以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语言学。这个定义,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科建设的两大理论立场。

一是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首先,需要提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中与语言有关的核心议题,对相关观点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的成果之一,由卫志强编著的论述辑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凝练形成了几大主题,包括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演变、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方言、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和宗教、语言的文风等,这些主题在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框架时可

作为参考。其次,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和语言学实证研究的最新证据,对相关观点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检验、评价。例如,在语言的本质属性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语言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生产工具,那么,大语言模型所带来的变革是否挑战了以往对语言的理解?又如,关于语言的起源,恩格斯提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人类类化的最新研究对此是否支持?再者,对于现代语言学理论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立场会如何评价?比如,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的本质是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如何看待语言的发展演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共享其根本的立场、思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语言学主要的研究方法,比如内省法、田野调查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语料库统计等方法如何进行指导、改造、更新,最终需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上体现出来。

新时代如何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and 实践行动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科建设可

以从下面四个“坚持”入手。

首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打破印欧语眼光的束缚,坚持从汉语事实出发,立足中国实际做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语言学理论的普适性、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生搬硬套。近年来,汉语学界如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冯胜利的韵律句法、沈家煊的对当语法,都是中国语言学界坚持“第一个结合”的有益尝试。

其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充分挖掘中国深厚的思想资源和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将其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体系中。索绪尔以来,言文分离是一个长期的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需要探讨如何提升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结合研究的高度,特别是重视我国以汉字学、中国民族古文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学的优秀资源和成果经验。汉字对汉语构词造句的影响,有力驳斥了书面语言符号的“第二性”。汉字具有超稳定性,不仅经受住中华文明几千年社会文化的变迁,甚至可能是维系中华文明延续的载体,这对“能指一所指”的任意性对立构成了挑战,汉字的图像性或许是其根源。这对世界其他非表音文字的研究具有深远的语言学意义。

再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中国现实问题。除了继续加深语言文字的本土研究,更要进一步发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语言文字工作传统,加强在语言学领域中服务国家、服务党中央的研究工作。例如,形成“语言与社会发展”的中国化研究框架,做好语文教育,将语言扶贫、语言康复、乡村振兴中的语言服务、“一老

一小”语言服务等实践升华为理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下的语言学研究,围绕语言在民族交往、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作用这一核心问题,研究多民族语言接触与演化、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互动,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作用;发展“语言与制度建设”研究,分析语言规范对国家法治建设、党组织凝聚力建设的作用;发展“语言与国家安全”研究,探讨语言资源安全、网络舆情监控、语言人才储备的战略部署;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的语言政策,探讨将汉字树立为中国文化精神标识,展望将汉语推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语言的可行性路径。

最后,坚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学科建设。在树立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主体性的同时,胸怀天下,放眼全球,批判性地借鉴、扬弃、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早些年巴赫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元老之一。晚近一些的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韩礼德受其中国导师罗常培和王力的影响,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语言的认识论基础,其系统功能语言学注重语言在交际中的表达,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的实践性和整体性。法国学者勒塞尔克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批判了语言学脱离实践、呈现出个人主义的研究取向,试图在语言哲学中树立马克思主义大旗,这也值得关注。

综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应立足中国语言事实和现实需求,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打造具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及国际话语实力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观点

以现代化书写边疆治理新答卷

◇ 白帆 (中国边疆研究所)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到融入“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陆海统筹”,以及“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国家战略,我们党通过长远规划,扎实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确保国家战略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创造了边疆地区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

国家“五年规划”的实践充分表明,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每一个规划都紧扣时代需求,在前述基础上细化目标、完善举措,形成“一个规划接着一个规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推进节奏,既解决了边疆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也为下一个“五年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边疆治理的螺旋式上升。这种以规划为引领的边疆治理逻辑,既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有机统一,也彰显了问题导向与战略远见的深度融合。其蕴含的逻辑特征和实践机制,不仅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为全球边疆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样本,为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边疆地区更需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按照“五年规划”指明的方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通过多领域协同发力,持续探索更安全、更开放、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让边疆地区在民族复兴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战略作用。

技术加速时代的古典学更应坚守核心价值

◇ 顾礼鹰 (外国文学研究所)

古典学并非单纯对古代的追溯,其核心在于对崇高价值与品格的追求,是对虚无的反抗。若将“古典”与“古代”混为一谈,便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间接否定。我们在古典学中探寻的,是超越时间限制的永恒价值,而非仅是对过往的复刻。

在技术加速的时代,古典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人均每日接收海量信息、社交媒体对叙事的压缩、游戏对古典文学的改编等,这些看似鲜活的新子背后,隐藏着技术对古典学本质的冲击。技术虽强大,却无法替代人类去感受古典学中蕴含的深刻情感与灵魂的震颤,它无法像人类一样在阅读古典文献时产生共鸣,也无法真正体验古典文化所营造的沉浸式美感。当技术成为主导,可能会导致人类尊严与价值的丧失,引发灵魂的堕落与人文学科的腐化。然而,古典学在技术洪流中仍需坚守核心价值,即对意义的追问、对美的震颤以及对永恒的谦卑。这并非意味着古典学要固守传统,而是要在技术的浪潮中,保持对人类本质的洞察与坚守。

古典学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滋养与提升,而非单纯的技术应用。在技术加速的时代,我们更应坚守古典学的核心价值,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技术的应用,确保其能够促进个人灵魂的善与共同体品格的善。让技术成为古典学发展的助力,而非主导。只有这样,古典学才能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独特的作用,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永恒的滋养。